

民国文学中的 边缘作家群体

张堂琦 著

主编 李怡 张中良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山东文艺出版社

民国文学中的 边缘作家群体

张堂铸 著 主编 李怡 张中良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阶段性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文学中的边缘作家群体/张堂锜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 1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李怡, 张中良主编)

ISBN 978 - 7 - 5329 - 5156 - 7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0922 号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民国文学中的边缘作家群体

张堂锜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总编室)

0531 - 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页/2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5156 - 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之一

民国历史文化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李怡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民国”，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既是这一历史阶段文化自身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动向。

中国现代史上的“中华民国”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历史标志，还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曾为“民国”的民主自由理想而奋斗牺牲的重要事实，“民国”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深究的。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叙史”也一直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框架结构，从一开始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到1980年代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每一种命名的背后都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又都不可避免地产生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新文学”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拉开了与传统文学样式的距离，但“新”的命名毕竟如此感性，终究缺乏更理性的论证；“现代文学”确立了

“现代”的价值指向，问题是“现代”已经成了多种文化争相解释、共同分享的概念，中国之“现代”究竟为何物，实在不容易说清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确立的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但是这样以“世纪”纪年为基础的时间概念能否清晰呈现这一文学自主的含义呢？人们依然不无疑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叙史”的“民国”定位被提了出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民国文学史”命名的呼吁。

“民国文学”的设想最早是从事现代史料工作的陈福康教授在1997年提出来的^①，但是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2003年，张福贵先生再次提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的设想，希望文学史叙述能够“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②不过响应者依然寥寥。沉寂数年之后，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终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主动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量增加。国内期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海南师范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都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文艺争鸣》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还定期推出了专栏讨论。张中良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问题，我本人也在倡导“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在我看来，“民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十分正常，它们都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一次重要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深化，并且与在此之前的几次发展不同，这一次的理论开拓和质疑并不是外来学术思潮冲击和感应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属于中国学术在自我反思中的一种成熟。

当前学界的民国文学论述正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试图重新确立学科

① 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原载1997年11月20日《文学报》，后收入《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② 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香港《文学世纪》2003年4期。

的名称，进而完成一部全新的现代文学史；二是为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新文学”之外的文学现象回归统一的文学史框架寻找新的命名；三是努力返回到历史的现场，对民国社会历史中影响文学的因素展开详尽的梳理和分析，结合民国文学历史的一些基本环节对当时的文学现象进行新的阐述和研究。在我看来，前两个方向的问题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学术积累，并非当即可以完成的工作，否则，仓促上阵的文学史写作，很可能就是各种旧说的汇集或者简单拼贴，而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恰恰是文学史认识的最坚实的基础，需要我们付出扎实的努力。

从民国历史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为我们拓展一系列新的学术空间。

例如民国经济形态所造就的文学机制，民国法制形态影响下的文学发展，民国教育制度的存在为文学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怎样的文化条件、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怎样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等等。还有，仔细梳理中国现代作家的“民国体验”，就能够更加有效地进入他们固有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为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提出更实事求是的解释。

当然，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挖掘其中的创造“机制”绝不是为了美化那一段历史。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漫长里程中，在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目标远远没有完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值得我们如此“理想化处理”，严肃的学术研究绝不能混同于大众流行的“民国热”。今天我们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为了呈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可资借鉴的机制，以为未来中国文学的生长探寻可能——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中，我们习惯于在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寻找我们模仿的对象，通过介绍和引入西方文学的各种模式展开自己。殊不知，其中的文化与民族的间隔也可能造成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今，重新返回我们自己的历史，在现代中国人自己有过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成果中反思和批判，也许就不失为一条新路。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一套“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书，试图从不同的方向挖掘“以历史透视文学”的可能。这里既有新的方法论的倡导——诸如“民国”作为“方法”或者作为“空间”的含义，也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新论，有“民国”下能够容纳的特殊的文学现象梳理——如民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也有民国文学品种的崭新阐述。它们都能够带给我们对于历史和文学的一系列新的感受，虽然尚不能说架构起了民国历史文化现象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却可以说是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但愿我们业已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能够因此而思想激荡、生机勃勃。

2014年6月，北京

总序之二

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 学科拓展的有效途径

张中良

中国现代文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历史与文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品格是其立身之本。现代文学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与发展起来的，对传统有何承续，对当代有何影响，自身呈现出怎样的脉络等等，都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从这门学科正式确立的 1950 年代之初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观占据支配地位长达数十年之久。1980 年代以来，尽管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越来越少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一历史观仍然在起着柱石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的确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文学被阐释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正义性与新政权合法性的有力见证。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对象只有三十几年历史的这门新兴学科，地位迅速上升，许多高校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涵盖三千余年历史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地位相当，后来又吸纳了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

与古代文学同样属于一级学科中国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学科队伍快速壮大。学位制度建立之后，现当代文学硕士点、博士点星罗棋布。据初步统计，从1984年到2014年，已经通过答辩的现代文学（含跨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达2000篇之多^①。

在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阐释框架内，文学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作用得到重视，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到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再到抗战时期的工农兵文艺获得高度肯定；五四启蒙文学、1930年代的民主主义文学及自由主义文学、九一八之后逐渐发展到卢沟桥事变之后形成高潮的抗日救亡文学，也得到程度不同的肯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重要脉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观来审视现代文学的确有其合理之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历史是复杂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单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视角审视现代文学，就会有意无意地遮蔽甚至扭曲部分历史事实。譬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视角下，自由主义文学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对于现代文学的审美结构与风格特色及它对传统的继承与突破也显得关注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性视角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观照下，这些缺陷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然而，仅仅增加现代性视角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视角，还不能实现全面的历史还原。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而且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已经内化为文学的内蕴与风格。在民国视角缺失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文学脉络不仅得不到足够关注，甚而被给予有悖于历史主义的负面评价。抗战文学叙事残缺不全，一般

① 据洪亮辑录《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7期），1984—2012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1763篇；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博士点（含一级学科）40个左右，按每个博士点每年毕业3人计算，2013—2014年约240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累计总数约2000篇。

的叙述模式只说 1938 年 10 月 27 日武汉三镇失陷之前，全国文艺界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接下来便分区域叙述，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一派新天地、新人物、新风格；国统区文学揭露当局腐败，抨击日本暴行，表现民生苦难；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上海租界与香港，成为隐晦表达抗日意旨的特殊场域；沦陷区文学到 1980 年代中期才受到关注；至于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则很少提及，而且评价偏低。这样一种抗战文学叙事，怎么能够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相匹配呢！即使是左翼文学，由于忽略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其复杂性与其在民国文化生态中的位置也未能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

那么，为什么民国背景会被长期忽略呢？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眼光代替了历史眼光，人们往往把民国仅仅理解为政府，而民国政府因为腐败不堪才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这样一来，民国就成为一个否定对象，谈现代文学与民国的关系，主要是谈当局对现代文学的限制压迫与现代文学对当局的揭露批判。然而，实际上，民国绝不能简化为政府，民国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由先驱者抛头颅洒鲜血才终于建成，民国不管有多少新生的稚嫩、成长的扭曲，但毕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应该引为中国的骄傲；民国是一个国家实体，曾经为数万万中华儿女命运之所系，为世界 120 多个国家所承认；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自然有政府，也有法律、教育、文化、文学、艺术，更有民国的经济（工业、农业、金融、商业等）、军事、外交。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不少场合指称的是 1912 年 1 月 1 日至 1949 年 9 月 30 日这一历史时期。在将近三十八年中，中国承受了多少内忧外患，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但毕竟实现了南北统一，收回了部分被列强攫取的权益，尤其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确立了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存在着多少社会弊端，有着怎样的致命缺陷，但民国毕竟是民国，袁世凯的皇帝梦被枪声所惊醒，一代枭雄在惊恐不安中一命呜呼；张勋复辟，旋即破产，徒然留下一个笑柄；法律并非尽是一纸空文，身为教育部金事的周树人

据理力争，赢得了对教育总长的官司；经济、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均有长足发展，若非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正常秩序，中国现代化进程会取得可观的成就。

即以政府来说，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能一概而论。1912年1月至3月为南京临时政府，时间虽短，但已呈现出万象更新的气象。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为北洋政府，尽管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执掌权柄者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其间又上演过复辟的丑剧，而且百般防范、顽固抵御南方革命势力北进，但在此期间，北洋政府是国家主权的代表，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国土，在经济、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否则，怎么可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经济的大发展，怎么可能有巴黎和会上中国权益的最终维护，怎么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怎么可能有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文学势如破竹，站稳脚跟，走进课堂，在文学殿堂升帐挂帅？在北洋政府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北伐战争的最终胜利可以预期的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染上了“四一二政变”的血腥，但它毕竟是北伐战争的重大成果，而且到翌年6月终于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并于1928年12月完成了政权的统一。1930年代中国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说国民政府一点积极作用没有，否则，文学园地的拓展，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丰收，《家》、《骆驼祥子》、《边城》、《故事新编》、《死水微澜》、《新月诗选》、《望舒草》、《烙印》、《大堰河》、《义勇军进行曲》、《宝马》、《且介亭杂文》、《缘缘堂随笔》、《泪与笑》、《塞上行》、《画梦录》、《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经典的问世，就无法解释。即使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之时，国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悄悄地进行抗战准备（如聘请德国教官训练部队，进口新式武器装备，修筑吴福线、锡澄线高等级国防工事，成立专门机构进行抗战对策研究等）。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抗战建国的国策获得全民的共识，终于赢得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的结构性缺陷到抗

战胜利后充分显露，一方面挑起内战，另一方面歪风当道，五子登科，贪腐公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终于在大陆彻底垮台，不得不让位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政权最后垮台，只能说明它背弃了人民，最终为人民所唾弃，但这并不等于这个政权一开始就黑暗至极，否则，古今中外那么多王朝、国家先盛后衰又如何解释呢？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实录”，亦即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叙述中应予发扬光大。把中国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与叙述，不是为一个已经逝去的历史时期唱挽歌，更不是为一个已被历史证明最后失去生命力的政权唱赞歌，而是要还原民国历史文化的原生相，黑即黑，白即白，何时何处姹紫嫣红，何时何处污泥浊水。生态环境明了了，在这一环境中发生发展的现代文学生态系统才能清晰地梳理出来，丰富多彩的样貌与错综复杂的矛盾才能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样的研究与叙述才能既无愧于历史本身与优秀传统文化，也无愧于今人与后人。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正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发扬光大，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因此，我很乐于认同与支持。

2014年8月7日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南洋公寓

目录

总序之一 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可能	1
总序之二 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的有效途径	5
导言 瞬间的辉煌：民国文学边缘作家群体研究 的文学史意义	1
第一章 美善的雅集：南社与新南社	17
第一节 南社与《南社丛刻》	17
第二节 南社因我而内讧 ——访成舍我谈南社社务停顿始末	39
第三节 新南社与《新南社社刊》	42

第二章 放情的歌唱：湖畔诗社	71
第一节 湖畔诗社研究若干问题考辨	71
第二节 湖畔诗人的少年青春梦	94
第三章 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	106
第一节 “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	106
第二节 刘大白与白马湖	118
第四章 不平凡的“一般”：立达文人群	132
第一节 从《立达》《一般》看“立达文人群”的精神品格与写作风格	132
第二节 羸疾者的哀歌	
——“立达文人群”中的薄命诗人白采	152
第五章 开明夙有风：开明派文人	179
第一节 “开明派文人”的文化理念及其出版实践	179
第二节 评述夏丏尊及其作品在台湾的出版与研究	196
第三节 平凡文心，莲荷风骨：夏丏尊和他的作品	203
第六章 上海女性新声音：东吴女作家群	212
第一节 施济美与“东吴女作家群”	212
第二节 “东吴女作家群”其他成员的文学创作	224
后记	237

导言 瞬间的辉煌：民国文学边缘作家群体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过去对 1949 年以前的民国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多集中于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主流作家群体，例如 1920 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1930 年代的左联，1940 年代的文协，或是在文学史上具高知名度者如新月社、语丝社、新感觉派、七月诗派、东北作家群、京派、海派等，对这些主流社团流派研究的丰富成果已经成为民国文学史叙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其在文学史册上占有显著地位实属必然。

然而，对主流社团流派的过度重视，也不免使得文学史的叙述流于单调而重复。事实上，主流之外，众多边缘作家群体的存在，正是民国文学史精彩面貌形成的原因之一。社团流派大量涌现、异彩纷呈的现象，本身就是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在描绘民国文学发展轨迹时，众多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名声不响的社团流派遭到忽视其实是文学史叙述自身的损失。

有鉴于此，本书将把焦点置于 1949 年以前民国文学中的一些边缘作家

群体，探讨它们的形成、发展、特色与影响，试图填补文学史研究的一些空白，并对主流社团流派的研究产生具有学术意义的参照作用。

一 文学社团流派的繁荣发展是民国文学的一大特色

根据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的说法，现代文学社团出现的高峰期是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1922—1926年），从1922年至1925年，仅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就有“不下一百余”之多。钱理群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提到，“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艺刊物五十多种。而到1925年，文学社团和相应刊物激增到一百多个。”^①到了第二个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史料·索引集”时，也收录了3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社团240个。这说明了文学社团、流派、刊物在民国时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而这和民国文学取得丰富多样的成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贾植芳所分析的：

从1917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之间，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文学的历史时期，其所以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出一个历史新纪元，取得自己的历史性成就和影响，应该说是与三十多年来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的不断兴起、演化和发展有着直接关联和影响的。正像春秋战国时期，在历史激变的时代形势下，形成百家竞说，孔北老南，九流十家，相继并作那样一种学术黄金时代一样。这两个历史时期，前后辉映，它们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所向披靡，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为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新的道路，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②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6。

② 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卷（杭州：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页1。

他用“学术黄金时代”形容民国时期的文学表现，并将之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相提并论，应该说这样的认知是有其学理依据的。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明显区别的标志之一，是大量涌现的文学社团流派。中国古代尽管有竹林七贤、公安三袁、江西诗派等文人群体的聚合，但缺乏现代社团所具备的明确宗旨、规约、组织、会费、机关刊物等“形式要件”，而且数量甚少，对当时文坛所产生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但民国以后的社团流派不仅数量空前，而且是促使新文学运动日益丰富、不断前进的重要推力。在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1993）中，就收录了社团流派辞目1082条，其中社团就有1035条，真如张中良所言：“文学爱好者自由结社，文学社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泛、色彩之丰富，前所未有。”^①不管是目标宗旨的为人生、为艺术、为革命，还是政治区域的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时间阶段的五四、30年代、抗战时期，抑或是文学思潮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甚至是雅与俗、新与旧、文言与白话、城市与乡村、写实与浪漫，都有相应的文学社团摇旗呐喊，也有众多的文学流派应运而生，民国文学的生态系统因此显得多样、丰富、精彩，呈现出前所未见的百舸争流、相生相融的精神风貌。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的朱寿桐曾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社团的活动基本上不再可能，除非是地下状态的。五〇年代各地还曾有过沙龙性的文学社团或俱乐部式的文学小圈子，例如江苏高晓声、方之、芦芒等组织的‘探求者’，不过几乎在它们刚一露面之际，马上遭逢‘反右’等政治运动，全都给打下去了，甚至连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合法’组织一度也终止了活动。”^②假如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就更明确地可以说明，在清

① 张中良：《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页58。

② 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16。